

崛起困境及其超越

王海腾

(中共中央党校 国际战略研究所, 北京 100091)

摘要: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国家之间的不信任会加剧,造成崛起国家必须面对崛起困境。现代背景下崛起中国对抗不信任困境的关键方法就是观念建构。只有在时代背景和国际社会的新变化中具体分析不信任的根源,才能超越崛起困境,赢得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良好环境。崛起的中国当前面临崛起困境,只有认真研究中国的崛起困境及其解决思路,才能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崛起不信任困境;超越困境;观念建构;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4)01-0067-04

不信任困境普遍存在于国际政治之中。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指出的:“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1]34} 一个国家无法确定另一国的意图时,如果倾向于认为另一国的对外意图是善意的,那么就会选择信任该国家并与其合作;如果倾向于认为另一国的对外意图是恶意的,那么就会选择不信任该国家并对其压制。米尔斯海默指出:“任何国家都不能肯定另一个国家不会以进攻性军事力量攻击它。这并不是说国家非得怀有敌视意图。确实,体系中的所有国家也许都非常仁慈善良,但它们不可能确信这一判断,因为意图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证。导致侵略的原因有多种,任何国家都无法肯定另一个国家不会因其中一个原因而产生侵略动机。”^{[1]34}

一、不信任困境

权力转移是以特定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开始的。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国家之间的不信任会加剧,因为权力转移必然伴有国家相对实力的明显变化,同时崛起国的发展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其自身对外政策的改变,这种变化会成为现状国或者邻国不信任进而抵制崛起国的口实。像崛起国加大对外投资或者扩大出口的行为,可能会被指认为掠夺当地资源以及侵占世界市场;崛起国对外宣传和传播民族文化的行为,会被指证为是输出价值观或者文化侵略行为;甚至崛起国常规的军事演习行为也会被夸大为怀有意图的

军事挑衅行为。由于现状国无法确信他国的真实意图,往往就会通过考察他国现时的行为以及以往的历史经验来判断崛起国的意图,说到底,国家寻求安全的方法是权力而非意图,是用权力代替意图。正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指出的:“作为国际体系的一员,每个国家经常是在暴力的阴影下处理本国事务的。由于一些国家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使用武力,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小心戒备——或是听凭在军事上更为强大的邻国的摆布。国家间的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会经常爆发,而是说由于各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使用武力,因此战争随时可能爆发。”^[2]按照华尔兹的逻辑,国家生存的前提在于能够随时抵御他国可能发起的对于本国的进攻,因此国家追求权力的目的在于保证安全,如果权力面临下降的危险,国家必然会对对手的意图更加敏感,不信任就更容易产生。所以,罗伯特·基欧汉也指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减少对预期的信心,因而可能导致政府对未来前景产生严重的怀疑态度。……高度的不确定性,还会降低各行为体在特定的时间内达成互惠协定的能力,更不要说它对行为体关于将来互动是否出现的预期产生了影响。也就是说,它能够导致一种形式的‘政治市场失灵’。”^[3]

不信任困境在当前国际体系下、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无序的,既没有统一的超越一切单位之上的世界权威,也没有像国内法律一

收稿日期:2013-10-19

作者简介:王海腾(1985-),女,山东临沂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和大国关系研究。

样具有强制和普遍约束力的国际机制和国际法庭,更没有世界统一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这种不信任的困境是无法自然消除的。也就是说,崛起中国需要积极主动地采取有效的政策来应对这种不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改善国家崛起的外部因素并推动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尽管在过去的大国崛起历史中,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代有成功突破崛起困境的经验借鉴,也有未能突破崛起困境的教训汲取,但是时代在改变,当前国际社会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化,新的国际环境需要新的治理之道。在当今国际社会观念的互构和社会的交往变得日益频繁和重要,新形势下不信任困境的突破必须建立在对国际社会的这些基本认识之上。因而,罗伯特·W·科克斯30多年前就预测道:“国际生产动员着社会力量,社会力量对国家本质和未来世界秩序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力量,才可以对这些影响加以预测。”^[4]因此,科克斯认为理论研究不应该建立在理论研究之上,而是要建立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以及经验-历史的研究之上,实践、经验和历史才是概念和假定的实验场所。

二、不信任困境的超越

现代背景下崛起中国对抗不信任困境的关键方法是观念建构。观念是国家间建立互信的转化器,因为权力转移过程对崛起国的国家行为的预先设定,其他国家对崛起国的定位和国际舆论会向着不利于崛起国的方向发展。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大概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大国彼此畏惧。它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对方,担心战争迫在眉睫。它们预测危险,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信任的余地。”^{[1]35}进而,彼此敌对的大国将这种危机传递给对手的邻国,使邻国对其的畏惧与日俱增。在《大国政治的悲剧》结尾处,米尔斯海默甚至预言:“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而会是个决心要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这不是因为富裕的中国就会有不良动机,而是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使其生存几率最大化的最好办法是成为本地区的霸主。”^{[1]421}在这里,米尔斯海默将生存战略作为解释大国行为的逻辑,他认为,大国一般会瞄准四个基本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追求地区霸权,这主要基于全球霸权是不能实现的,任何大国都不可能征服和占领被海洋隔离的地区,因为巨大的水体无疑会限制力量的投放,因此一个大国可以征服它从陆地能到达的相邻地区,但是绝对不可能获得全球霸权;第二

个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财富,在这里国家关注相对财富是因为经济实力是军事实力的基础,因此大国把很大的力量用于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不但意味着增加整个社会财富,而且还是获得超过对手军事优势的有效途径,所以大国经常把富裕的国家和朝富裕方向发展的国家作为严重威胁,而不管其是否拥有庞大的军事能力,因为财富可以很容易转化为军事能力;第三个目标是控制地面军事,因为那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军事力量的最好方法,这意味着国家要建立强大的陆军、空军和海军来支援这些地面力量,由于地面力量是军事力量的主导形式,因此大国希望在其所在地区拥有力量强大的陆军;第四个目标是寻求超过对手的核优势,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一国拥有世界上唯一的核武库,为它提供摧毁对手的能力而无需担心报复,而在现实世界中往往会发现对手在尽最大可能努力发展自己的核报复能力,大国生活在一个相互确保摧毁的世界里^{[1]157-161}。

在国家应对崛起不信任困境的过程中,崛起战略本身就包含着悖论,因为国家在参与到国际竞争过程中的同时,国家也必须接受国际合作的考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指出:“国际政治的某些结构性因素,预先限定了事态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安全困境和囚徒困境。另一方面,这样的情势并不决定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有选择的余地,人的抉择有时能够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虽然无政府状态这个大的结构不利于国家间的合作,但是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还是可以出现的。”^{[5]25}他指出了在应对国际困境时用建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可以带来的效果,即“思考认同和利益的变化如何在有的时候导致国家政策发生微妙的变化,有时甚至导致国际事务发生深刻的变化”,帮助我们理解“偏好是如何产生的,知识是怎样获得的”^{[5]11}。约瑟夫·奈在这里实际上指出的主要方面是“困境悖论”,一方面,要承认崛起国的发展困境是客观存在和不可避免的,是由国际体系的竞争性决定的;另一方面,国家要试图通过利益认同上的互动和观念建构,实现国际舆论的逆转和发展困境的突破。国家的这两种认知是相互联结的,是解释“困境悖论”的两个向度上的原因,即国家必须承认崛起困境的不可避免性,又必须相信崛起困境的可突破性。我们按照困境悖论的逻辑继续分析会发现,如果国家强力推进发展,不顾发展环境的客观状况和国际舆论的影响,那么国家的发展可能会招致更多的非议和压力,最终被崛起困境制约发展。

相反,如果认识到国家发展外部环境的恶化趋向,没有积极主动采取外交政策来应对变化,反而改变国内政策甚至抑制发展和崛起,那么非但使国家在国际竞争和国际权力位阶上处于劣势,而且还有可能带来更加被动的发展环境和舆论。因而,我们这里将崛起困境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崛起中国如果能够应对好崛起困境,那么就能够实现国家发展环境的逆转和权力转移的实现;如果崛起中国没有处理好崛起困境的相关问题,那么就可能增加发展的外部困难而阻碍国家的崛起进程。这一国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性的难题通常成为国家崛起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由于国家处于国际舆论压力之下,在发展过程中,国内发展、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常常难以兼顾得很好,因此,所有崛起中的国家都承受着这种困境的压力,国际结构与国内发展之间的这种互动是现代国际体系中很多大国兴衰历史上的深层原因。

按照本体论原则,属性是在关系中形成的,我们在国际体系的权力框架之下理解各个国家的行为动机会获得更深入的理解。修昔底德早就指明,使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①。奥根斯基在探讨权力转移时指出,没有国家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自身权力的下降和愿意转移权力的,崛起后的大国常常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而主导性国家则是作为现存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而想要维持现有秩序的“满意国家”,当“满意国家”与“不满意国家”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发生竞争与冲突时,战争就会爆发,因为“不满意国家认为有机会通过战争赢得秩序主导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战争来改变现状”^[6]。修昔底德对相对权力地位的关注,奥根斯基对国际秩序主导权的关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弗雷德里克·邓恩(Frederick Dunn)对这一关联予以了清晰的阐释,只要无政府的自助观念依然存在,维持权力地位这一目标将是国家的首要考虑。肯尼思·华尔兹将权力框架下的国家行为归结为三种意象综合作用的产物,三种意象分别为人类行为、国家内部组织结构和国际体系,三种意向影响国际政治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权力:个人或者说人性对权力的追逐、政府对国内权力的追逐以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国际权势的追逐,它们共同作用于国际体系的权力框架,导致冲突和战

争^[7]。

奥根斯基在修昔底德、汉斯·摩根索、肯尼思·华尔兹对权力的论述基础之上,对国际权力转移过程的发生和影响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在权力转移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分析出相对权力地位的重大变化对现状国和崛起国产生的深刻影响,包括对他们的观念以及外交行为和对外政策引起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崛起不信任困境容易产生,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情愿让出权力,而国家之间竞争的关系又会使权力的增长必然引起恐惧的增长。对权力的争夺主要体现在现状国与崛起国之间,而恐惧的增长则常常发生于崛起国与其邻国之间。

在这些不信任的观念中,不信任的程度因时因地而异,在各个国家之间是不同的,在他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也不相同,而且在各个不同领域也不一样。现状国和邻国对于崛起国的不信任程度相对较严重,其他国家相对较轻微,因为现状国是受权力转移影响最大的当事国之一,而邻国由于地理位置和或多或少的资源、边界领土纠纷等对于崛起国军事实力的增长早有顾虑,更容易产生不信任情绪。政府及其官员是直接接触国际权力和国际事务处理的主体,他们对于国家实力变化的敏锐感觉和实际体会,自然要比国内普通公众甚至公众精英深刻得多,产生的不信任观念也要比国内公众更加深切。此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崛起引起的恐慌大相径庭,军事力量的增长会引发最大程度的不信任,因此产生的冲突也是最严重和直接的,其次是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至于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一般会被视为国家吸引力、创新力或者品牌意识的发展和提升,并不会引起不信任困境。因此,当前中国的崛起对于非洲和拉丁美洲而言基本没有恐惧可言,但是对于美国和东亚、东南亚的多数国家而言可能就会让他们的排斥和恐惧久久不能释怀。中国商品的出口对于他国公众或者商业合作伙伴来说可能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件,但对于相关国家的政府来说可能就是冲突和摩擦的根源。欧盟各国对于与崛起中的中国进行政治和国际机制上的合作抱有极大的热情,但是对于中国与其进行的经济贸易合作则多有戒心,频频搬出WTO争端处理机制。

^①这是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言。即在现实中,两个大国的战略判断与感情好恶的结合,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导致健康的竞争变成你死我活的敌对,甚至更糟,这就是政治上有名的“修昔底德陷阱”。

三、破解不信任困境， 实现中国梦

当前崛起的中国面临崛起不信任困境，钓鱼岛问题的争端、南海问题的升级、美国与日本对蒙古稀土资源的大举插手，无一不是中国崛起面临不信任困境的表现。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存在，将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中国梦”的实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国崛起良好国际环境的营造。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中央政治局七大常委齐聚，充分体现了新时期中共中央对中国外交布局和外交工作的高度重视。用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话说，这次会议是“专门召开”，其隐含的意义是，会议规格之高是罕见的，并且体现了高层对外交工作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有关媒体对此解读认为，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周边安全环境的配合，只有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中，中国才能在有限而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内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并应对崛起中出现的各种不信任困境，最终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中国梦”。

与历史上的崛起不信任困境相比，中国当前面临的困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中国当前的崛起行为主要发生于经济领域，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的发展，而在军事力量上并没有显示出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与历史上英美的崛起、德日的崛起均有所不同。中国崛起的这种不同，一方面可以缓解中国面临的不信任困境，毕竟国际冲突发生的最直接原因还是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突破崛起困境、建立战略互信的有力工具和重要佐证之一，表明中国既不

追求武力的征服，也没有输出自身的政治观念和价值观，而是倡导文明的多样化和差异性。历史上德日的崛起以侵略战争和资源掠夺为手段，以此克服崛起困境的方式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丧失了国家发展的最佳阶段。美国在二战之前和冷战期间都致力于推行美国式民主和输出本国价值观，这在一个文明更加多样化的今天显然已经行不通，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和中东乱局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上面我们所强调的是时代的变化和国际体系的新特点，只有在时代背景和国际社会的新变化中具体分析不信任的根源，才能超越崛起困境，赢得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良好环境，实现“中国梦”。

参 考 文 献

- [1] 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M]. 王义桅, 唐小松,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2] 肯尼思·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M]. 信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08.
- [3] 罗伯特·O·基欧汉.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 郭树勇,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82.
- [4] 罗伯特·W·科克斯. 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 超越国际关系理论// 罗伯特·O·基欧汉.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 郭树勇,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18.
- [5] 小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M]. 张小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6] A F K Organsky. World politic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123.
- [7] 肯尼思·华尔兹. 人、国家与战争[M]. 信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179

[责任编辑 彭国庆]